

行 龙 著

山西 何以失去曾经的 重要地位

行 龙 著

山西 何以失去曾经的 重要地位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行龙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440 - 4637 - 4

I. ①山… II. ①行… III. ①社会发展史 - 研究 - 山西省
IV. ①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8857 号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

SHAN XI HE YI SHI QU CENG JING DE ZHONG YAO DI WEI

责任编辑 郭志强
复 审 潘 峰
终 审 张沛泓
装帧设计 王春声 陶雅娜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4035711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2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440 - 4637 - 4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351 - 4120948

目 录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观察 1

- 一 古代山西的重要战略地位 1
- 二 明清晋商的兴衰与西方势力的侵入 4
- 三 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三十八年 9
- 四 历史的延续及其启示 12

汾河清 山西盛 16

- 一 唐宋以前汾水大而清 三晋强而盛 16
- 二 明清以来汾水浊而小 沿线争水激烈 19
- 三 50 年来的汾河治理及其现状 23
- 四 新世纪的希望 25

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 27

- 一 人口 土地 环境 27
- 二 水案概略 29
- 三 历史启迪 32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与灾害

——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 34

- 引言 “时过境迁”环境史 34
- 一 “枕水际山”：晋水流域的环境要素 37
- 二 “峪水为灾”：明清以来的环境恶化与灾害 43
- 三 “长时段”：并未完结的演变过程 51

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晋商与地方社会	56
一 学术简评	56
二 从社会史角度去研究	59
三 注意三个方法	63
山西商会与地方社会	70
一 山西商会的创立	70
二 山西商会与地方社会	76
三 传统晋商与新式商会	84
秧歌里的晋商与晋中社会	90
一 戏与商：晋中地域文化中的祁太秧歌	91
二 盛世繁华：祁太秧歌中的晋中社会	96
三 苦乐悲欢：祁太秧歌里的商人世界	101
太行精神永存	107
一 “我们在太行山上”	107
二 “兵民是胜利之本”	110
三 太行精神永存	113
遗世独立的政治标本——李顺达	116
一 翻身前后	116
二 互助生产	119
三 农业合作社	124
四 金星人民公社	130
结 语	136
图像历史：以《晋察冀画报》为中心的视觉解读	138
引言 从“左图右史”到“视觉研究”	138
一 画报内史：创制、演进、流布	141
二 “笔杆机器”：设备、技术、群体	150
三 三大论域：战争、革命、生活	158

四 余论：兼及图像历史的一个讨论	166
开展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	170
一 已有成果的不足	170
二 前后相继的集体化时代	173
三 “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	178
集体化时代的剪子湾村	185
一 缘起	185
二 集体化时代的剪子湾	188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述略	199
一 缘起	199
二 概貌	202
三 三个具体采集单位	208
四 结 语	222
后 记	224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观察

如果说“近代中国何以落伍”这样一个“李约瑟之谜”已成为中外学界见仁见智的问题，那么，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也是我们应当关注和回答的问题。

去年年底出版的韩毓海教授的专著《五百年来谁著史》，再一次触动了山西各界人士的脑神经，新近第4次印刷的韩著以“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为醒目的封腰广告语更夺人眼球。但在我看来，这里的“核心地位”仍值得商榷，说山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拥有“重要地位”倒不为过。题目就这样借过来，改过来了。

“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历史的命题还是需要以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方法来回答。

一 古代山西的重要战略地位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山西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中原王朝注目。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已足以证明，山西自远古时代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不仅遍布山西南北各地，而且从绝对数量上来看，全国各地无出其右。传说时代的三位圣王唐尧、虞舜、夏禹，其首都均在今天山西的南部地区。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至今这些地区的历史遗迹和美丽传说仍然很多。

夏商周三代，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活动区域。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其弟唐叔虞在山西，晋国日渐成为黄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至晋文公重耳时期，厉行改革，奖励垦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终成一代晋国霸业。公

公元前633年发生的晋楚城濮（今河南濮阳县东）大战，强盛的晋国以少胜多，打败了同样强盛的楚国，从此晋代楚而成为“侯伯”，以王命而讨伐诸侯，大大小小各路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①，俨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齐、楚、燕、韩、赵、魏、秦，是为战国七雄，山西占其三。公元前458年，晋国的智伯与韩、赵、魏四卿瓜分中行、范氏全部领地，进而智伯又索地韩、赵、魏。韩、魏惧怕，唯赵襄子不肯割地给智伯，于是，智伯又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走保晋阳，三家围晋阳，岁余而不下。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围灌晋阳城，赵襄子派人潜出与韩、魏媾和，陈说“唇亡齿寒”之利害，由是韩、魏倒戈与赵结盟，智伯被杀，晋阳解围，三家三分智氏领地，是为“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意味着晋国公室领地几乎尽归三家，公室反倒成为附庸，而且意味着春秋以来长时间诸侯争霸局面的终结，七雄兼并的战国时代从此拉开了新的一幕。

秦汉时代，首都建在长安（今西安），晋西南属于河东郡，而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南、河内为“天下之中”，经济文化相当发达。《史记》讲道，此地“土地小狭，民人众”，人口密度相对较高。牛耕、耒种、铁农具、代田法均引领农业技术之先；水利、冶铜、制铁、盐业等相当活跃；临汾、洪洞的商人已经“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山西对匈奴的商业贸易在北中国也占有重要的分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动荡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一茬接一茬地持刀挥戈进入中原，三国（魏、蜀、吴）、两晋（西、东）、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等32个政权群雄逐鹿，轮番更替，好一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混乱场面。山西在这一分裂、聚合、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核心地带的角色。先是304年匈奴酋长刘渊起兵离石建汉国，不久迁都平阳（今临汾），继则儿子刘聪打下长安灭西晋，由此开始了一百多年的所谓“五胡乱华”。398年，拓跋鲜卑迁都平城（今大同），取并州，灭后燕。接着南北讨伐，四处征战，东到辽宁，西至河西走廊，南到华北平原的北燕、南燕、西秦、后

^① 《左传》昭公三年。

秦、西凉、北凉、南凉、后凉等政权先后被征服直至灭亡，一百多年来五胡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由此结束，黄河流域重归统一。再后来，北魏宫廷政变，高欢建东魏 16 年，其子高洋建北齐 27 年，晋阳（今太原）都是北中国实际的政治中心。那时，高欢以丞相身份居住在晋阳，并在晋阳兴建大丞相府，留下亲信在首都洛阳治理朝政。北齐在晋阳设有行宫和六府，作为中央政府的分设机构，27 年六个皇帝中，就有五位或即位或崩亡于晋阳城。实际上，晋阳就是“别都”，军事上的重要性远在“上都”洛阳之上。

魏晋南北朝大动荡之后是隋唐的大统一。隋命短促，前后仅 38 年。在隋末各地起事和防御突厥的过程中，后来奠定大唐基业的太原留守李渊趁机起兵太原，南下龙门渡河，灭隋建唐。隋唐两代，太原以北地区一直是突厥南进和隋唐防御的交战地，其中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时期战事最多。除此以外，汾河漕运、农田水利、制铜冶铁、木构建筑均为山西值得称道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并州治所晋阳在隋唐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隋代晋阳是黄河流域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政治中心，隋文帝置河北道于晋阳，最高长官尚书令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晋阳又是唐朝的发祥地，武则天时期曾定晋阳为北都，这一时期晋阳城由都城、东城与汾河之上的中城三部分组成，商业贸易繁盛可见。

“安史之乱”后，唐朝走向衰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一个分裂割据的混乱时代，又有一个少数民族沙陀族进入山西。895 年，沙陀首领李克用占领山西大部分地区后，以太原为中心晋爵晋王，建立了春秋战国时代后的又一个晋国。907 年，朱温篡唐建梁，开启五代混乱历史。五代时期的五个朝代中，就有三个由沙陀人建立的小朝廷（后唐、后晋、后汉）以太原为根据地，进而夺取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951 年，刘崇又在太原建立北汉，这个北汉正是北宋统一全国过程中最后被征服的割据势力。鉴于唐末五代以来，割据势力往往以晋阳为根据地，渐次坐大而争夺天下的事实，980 年，宋太宗亲率大军进攻北汉，火烧水灌晋阳城，千年古城毁于一旦。从这个时候开始，太原府又改为并州，治所也由河西移置到河东，新的晋阳城就在现太原迎泽区、杏花岭区一带。

北宋统一全国后，山西不再是割据中心。虽然在抵御契丹、抗辽抗金、反元起义中山西都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比较战火弥漫烽火连天的中原地区而言，山西还是一个受战争创伤较轻的地区，也是一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已故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中曾列举山西人口密度、印刷、科举、商税、戏剧诸方面的事实和成就，认为“金元时代，山西高原的经济文化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关中平原地区发达”。

从古代山西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每逢中国历史的分裂割据时代，山西的战略地位就会发光凸现，为人注目，而统一稳定之时，也是山西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之时。谭其骧先生探究其原因时总结道：

这是因为，山西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它对河南、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这在过去一刀一枪打仗时，是很占优势的地势。又因为盘踞山西的割据势力大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武力很强，因而能攻则取之，退则守之，长期割据称雄。^①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的是，分裂割据时代，不仅是生灵涂炭、经济凋敝的时代，同时又是民族冲突与民族交融的时代。一部中国古代的历史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冲突和交融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山西地处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带，这样的战略地位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也是有贡献的。

金元以降是明清，山西历史开始了新的进程。

二 明清晋商的兴衰与西方势力的侵入

按照通行的中国历史分期标准，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点，但从区域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明初却是山西历史发展的重要界标。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需要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和特性来划分必要的历史阶段，依样画葫芦地将中国“大历史”的分期套用搬到具体的区域历史研究中来，往往难免隔靴搔痒。

之所以将明初作为山西历史的重要界标，我以为有两个历史现象应该值得特

^① 谭其骧：《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应山西史学会之邀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的记录》，《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

别注意。一是明初山西地区人口数量膨胀进而导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正是由于金元以来尤其是元末明初山西地区所受战争创伤较小，此时山西已成为华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明初，山西人口总数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在这种“人稠地狭”的情况下，才有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大移民，才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世代相传、延绵神州的民谣。可以说，明初大槐树移民是山西人口膨胀的明显信号。之后，山西人口除明末清初短暂的起伏外一路直升，光绪初年大灾前全省人口总数达到1640万余的历史最高点，这个数字比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所得1431万余还要多出200多万。我们知道，在生产技术水平比较有限的近代社会，对山西这样一个“山多地少”的内陆省份而言，一定数量的人力就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又会带来沉重的人口压力与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明初山西人口膨胀还引发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晋商的崛起。学界一般认为，山西商人的崛起得益于开中法，而开中法正是在明初正式实施的。所谓开中法就是商人运输粮食供给边塞军士食用，朝廷付商人以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和地区贩盐。盐在明代属于专利品，大同、太原又是“九边”重镇，山西商人得天时地利，便捷足先登而发达。我们应当承认，开中法对晋商的崛起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明初山西各地普遍的经商风气实为晋商崛起的社会基础。事实上，除了盐类以外，北方的“茶马互市”、金银铜铁、绸缎布匹、皮货药材等都是那时晋商大规模经营的行当，而这种勃然兴起的经商风气之根源，就是“人稠地狭”的社会现实，所谓“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稠，田不足耕也”^①。商业活跃的太谷县也是“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②。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大批晋商驰骋南北设号建业，不仅在全中国范围内留下了他们深深的足迹，而且在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国际贸易”，其诚信立业开拓进取的精神足令朝野上下钦羡叹服。然而，世业常是不敌世运。明清以降，随着跨海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自东向西的步步渗入，东

① 光绪《五台新志》卷二，“生计”。

② 民国《太谷县志》卷四，“生业、商会”。

南沿海地区首先成为中西交冲的前哨，同时也就成为军事、外交、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之前朝野瞩目的北部边患狼烟转化成为沿海的“坚船利炮”，晋商在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斟酌应对，山西在这一变局中已经退位。

尽管晋商是明清山西社会最可称道的历史现象，但那个时代，山西毕竟还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在土狭人稠、田不足耕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空间十分有限，民人终岁耕耘劳作，能够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所需已属不易，更何况天灾人祸，尤其是频繁的旱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光绪三年（1877）山西突遭“二百年未遇”之大旱，卖妻鬻子，人相蚕食，鼠狼横行，尸骨遍野，真正的惨不忍睹。灾后全省人口亡失至少三分之一，大面积土地荒芜，商业停滞，文化凋敝，地方财政难以维持，时任巡抚曾国荃惊呼“二十年以后元气可以稍复乎”？

也就是在曾国荃赈灾的废墟上，从太行山之东走来了一拨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人。以李提摩太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不仅带来了数万两赈银，同时带来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精神。传教士们有组织地深入灾区发放救济金，在晋南地区一些县的发放量甚至超过了官府发放的银钱数量，三晋大地上第一次有规模地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老百姓就是在这样嗷嗷待哺命悬一线的生死线上感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灾后，激动的灾民以中国传统的方式立碑铭记传教士们提供的帮助，甚至到“洋大人”李提摩太的住处索要他的大照片准备供奉在神庙里^①。李提摩太是当时在朝廷中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士，赈灾前后，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山西当局提出了修造铁路、开发矿产、发展教育、开办工厂和制造厂等建议，地处内陆、风气闭塞的山西开始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浸润。其实，虽然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已经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但直到 1860 年签订的《北京条约》规定天津开埠后，山西才开始了与西方势力的直接接触。李提摩太的建议在后任巡抚张之洞、胡聘之的手上渐次推行开来。19 世纪的最后十年，山西开始出现了机器局、火柴局、工艺局、纺织厂等近代工业，由筹借外资开发晋东南矿产而引发的全省各界收回矿权运动直把山西历史带入 20 世纪的最初十年。1902 年中西合璧的山

① [英] 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4～125 页。

西大学堂在太原成立，1907年山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正太铁路通车，这是近代山西社会经过中西交冲不断磨难结成的两个正果。

近代资本主义势力进入山西后，一方面做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又以侵略者的面目带来了邪恶与血腥。《天津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开始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内地，他们修建教堂和住宅，兴办医院、学校和孤儿院，他们禁拜神灵，侵占民田，袒护教民，欺压乡里，中西文化的冲突最终演化成为世纪之交最为惨烈的血腥冲突。1900年义和团轰然兴起于山东，转而京津地区成为主要活动区域，而地处内陆的山西却以烧杀洋人之惨重闻名于世人，以致中外人士皆惊呼“晋案为最大”。1901年清政府“庚子赔款”外“山西另议”赔款近480万两，超出了全省全年的财政收入。巡抚毓贤及众多义和团民被杀，读书人世代借以晋升的科举取士制度被戛然停止，地方官绅民众被迫为死去的传教士修墓立碑，种种件件，撕肝裂肺。这是一个双重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至于说到明清以来就闻名于世的晋商，它在中西交锋的格局中也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彩。学界对晋商衰败的原因已有很多的探讨，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角度，还是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俗学的方法，晋商衰败的原因都应该从外部的历史条件和内部的发展机制中去寻求答案，也就是要把晋商的活动放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下进行把握。从外部条件来讲，晋商的衰败实与清朝的衰败同步而行。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历史的全盛时期，也是晋商最为辉煌耀眼的时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步步侵入，国内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气运衰微的历史阶段。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将清朝从繁盛推向灭亡，晋商在历次内外战争中同样四体鳞伤而江河日下。曾在平遥蔚丰厚票号做事达半个世纪的李宏龄感同身受地讲道：

前清同治至宣统间，驻京理事，迭遭甲午、庚子、辛亥之乱。事起仓猝，为国家未有之难，亦为商界未有之奇变。方事之殷也，区区商号

如一片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①

战争不仅阻断了国内长江南北商业贸易的线路，而且废弃了晋商起家的恰克图、俄罗斯“中路贸易”通道。韩毓海先生认为，这种“国际长途贸易的衰落”是晋商和山西票号衰落的重要原因^②。与之相应的是，随着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如洋布、洋纱、百货、日用、化妆、五金、文具、食品的大量倾销，山西商人经营的传统铁业、皮毛、茶叶、土产等纷纷失去市场而一蹶不振。“方今时局，日新月异，情形迥非昔比”，李宏龄斯言堪为深中肯綮。

就晋商内部的机制而言，这个群体已经失去了创业初期那种寸积铢累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如果说，像“学徒制”“股份制”这样的内部机制曾经对晋商的崛起和发展起到过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话，那么，到后期这样的制度已渐次蜕化甚而演变为钩心斗角。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日升昌经理雷履泰和副经理毛鸿翱因权、利之争产生的相互倾轧，两人矛盾激化后毛氏退出日升昌另起炉灶，互相间的仇恨更加升级。雷氏为儿子起名叫雷鸿翱，毛氏也当仁不让地为孙子起名叫毛履泰，不是你当我的儿子就是他当我的孙子，真叫人辈分难分哭笑不得。事实上，后期晋商发财致富后，大多携带资金返回故里，他们建宅置地，窖藏货币，成为不折不扣的土财主，而没有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当地的近代工商业。因此，晋商虽有钱，但山西没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走进昔日富可敌国的祁、太、平地区，能够感受到的只是高墙窄弄夸富斗强极尽考究的票商旧宅。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如此也就是一场繁华旧梦。

还有可痛的是，在新式银行蜂拥兴建的竞争局面下，老迈的晋商先生们已经不能因时变通锐意改良，后来的弟子辈也是“饱暖思淫欲”地浑然不知天地人间，待到辛亥革命到来，晋商与清王朝一样同时走向衰败与衰亡。还是那位李宏龄曾以协同庆票庄为例痛心疾首地写道：

厥后继起者，大率按部就班，绝非应变之材。故不逾十稔，一误于连号之牵制，再误于庚子之铺张。轰轰烈烈之事业，竟一落千丈矣！履

①（清）李宏龄：《同舟忠告·自序》，（清）李燧、李宏龄著，黄鉴晖校注：《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②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霜坚冰，其来者渐，岂待辛亥革命全体糜烂，而始一蹶不振哉！^①

辛亥革命是晋商走向彻底衰败的一个关节点，也是山西近代历史的一个关节点。在群体的晋商日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从文山沱水走出来一位日后叱咤风云的阎锡山。

三 阎锡山统治山西的三十八年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8年，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38年。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中国历史由此进入民国时代，民国时代又是一个军阀割据战火延绵的时代。军阀割据与民国相始终，阎锡山与民国山西相始终。在南北各地无数大小军阀争斗火拼旋生旋灭的大浪淘沙过程中，唯独阎锡山一以贯之地统治山西38年而成“不倒翁”，山西也曾成为全国关注的“模范省”，这个模范就模范在它在一个混乱的年代里建立了一种秩序，革命党人在全国没有做到的事情，阎锡山在山西做到了。

青年时代的阎锡山走过了一条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样的革命道路。18岁以前，阎锡山在家乡读私塾、当伙计，也曾有过无业流浪的生涯。1900年到太原，次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选派赴日公费留学，同批的同学还有后来辛亥太原起义的黄国梁、姚以价、张瑜等20人。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随后加入革命党的军事中坚组织“铁血丈夫团”。1909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结束留学生活回到山西，通过为留学生准备的选拔考试晋升第86标标统（团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告捷，12月29日太原起义爆发，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次年9月，孙中山来晋视察称“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②。这就是青年阎锡山由“土娃”到都督的成长路线，也是一代先进青年立志救国从事革命的道路。

① 李宏龄：《票庄协同庆始末记》，（清）李燧、李宏龄：《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第22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0页。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社会。与直系、奉系等军阀投靠外国势力以图扩张的做法不同的是，阎锡山充分利用山西山河环绕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以“保境安民”相号召苦心经营山西。与那个时代多数先进的中国人一样，阎锡山也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不同的是他把民族主义的情节内化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和地方主义，传统的地方主义在中央政府分崩离析尾大不掉的难局中获得了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从河边、五台走进太原和山西，在他的眼里，首先是山西而后才有国家，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同样融入他的血液里。“保境安民”，也就是不参加内战，为山西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山西人民过上好生活。揆度历史，在一个军阀割据土匪猖獗的混乱时代，“保境安民”既为无奈亦为苦心。

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后，阎锡山在日本、蒋介石、共产党三种势力面前折中斡旋，用薄一波的话说是“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进而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同样也能风靡全省流行全国。所谓“守土抗战”，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能守住就能存在，我们就当在守上努力”，“只要这块土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无论我们过去和现在如何评论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事实上是，他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扶植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山西战场共同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1943年，刘少奇在一份报告中讲道：

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①

阎锡山又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实践者，他所提出并力行的“用民政治”既是基于山西患贫积弱的现实，又是出于“生长斯邦，见闻较切，惕心怵目”的切身感受。“六政三事”：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及种棉、造林、畜牧，适应了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变动的潮流，在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就都不可以一概抹杀。从“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为出发点，阎锡山也十分重视山西的教育，普通小学、高等小学、专门学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校、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白话课本、注音字母等在山西均着力推进，有声有色。1919年10月，鉴于山西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举行，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在同阎锡山的谈话中称：“贵省教育发达，久已声闻海外，今日得亲至贵省观光，实为荣幸之至。”^① 20世纪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村本政治”，包括整理村范、村民会议、村禁约、村息讼会等措施，在那个强盗横行土匪猖獗的世道都是为人瞩目的事情。民国土匪多，唯独山西少，也是时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山西曾被北京政府列为“模范省”。山重水复疑无路，辛亥之后一代知识分子在苦闷彷徨中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各色人等不同方案纷纷登台亮相，阎锡山在山西的实践也应该被看做是这一社会潮流中的一种大胆尝试。

武装和地盘是军阀最基本的条件，在大多军阀拥兵自重抢占地盘的厮杀火拼中，阎锡山是一个注重建设者，或者说他是一面占地盘，一面搞建设。1930年中原大战前，阎锡山陆续成立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太原兵工厂、山西火药厂等军事机构，山西军事工业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产品数量均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中原大战后，在“建设救国”“自强救国”的口号下，重点又转向民用工业，1933年正式成立的西北实业公司，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包括钢铁、燃料、电力、机械、化学、建材、纺织、兵工、造纸、卷烟、火柴、皮革、面粉等多种行业的经济实体，奠定了山西工业的基础。清代末年就开始筹建而搁置的同蒲铁路在阎锡山的手上得以全面贯通。面对历史，阎锡山时代真正迈出了山西工业的步伐；面对现实，阎锡山时代的历史遗痕依然可寻。历史也真是有趣，阎锡山在山西的经营起始于军事工业，落脚于民用工业，目的也无外乎“强兵富国”，此与洋务运动何其相似乃尔，而此时历史已走过了半个世纪。

自从有了阎锡山，民国山西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社会。在中央政权分崩离析地方势力四分五裂的混乱民国，阎锡山却在娘子关内自行一套，治晋治民，在大小军阀无法做到之处阎锡山做到了，这就是一个时代和一个人物的历史辩证。抗战后期，《新民报》总编赵超构访问山西，所见所闻感慨良多：

^①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6页。